

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

王思明

成书于两千年前的《吕氏春秋》指出：“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。”农业发展离不开天、地、人的共同作用。而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告诉我们,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,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,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。

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·布劳格(Norman E. Borlaug)说过:“你无法在人们饥肠辘辘中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。”可见,民以食为天,食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和物质基础。

人类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两三百万年,其中 99%的时间里,人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而生存,或栖身洞穴,或构木为巢,或逐水草而居 (“有巢氏”时代)。自然界一切可食之动植物都是人类的食物,所谓“生吞活剥”、“茹毛饮血”, 反映的就是这种生存状态。

后来人们因烈日干燥、火山爆发等自燃起火而吃到了烧熟或烤熟的食物, 发现它们更加美味,也更便于消化。他们尝

试保留火种,进而发明了“钻木取火”的生存技能,人类饮食文化进入熟食阶段,即传说中的“燧人氏”时代。火的利用是人类饮食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。人类最早的一些发明创造,大多与食物加工利用相关,如陶罐、烤架。

可以说,在人类生存的几百万年中, 与其他高等动物一样,主要通过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维持生存。 由于生态环境和季节的因素, 其食物来源很不稳定,加之生活游移不定,文明因素难以积累。这一切在农耕畜牧发明之后才有了改变。

为了获得更稳定的动物食品来源, 先人开始尝试圈养动物,地上跑的“野兽”驯化成“家畜”,天上飞的“野禽”驯化成

“家禽”(传说中的“伏羲氏”时代)。“家”字“屋”中有“豕”(猪),反映了野猪向家猪驯化的历史过程。因季节变化所致的动植物资源的不均衡及人口增加的因素,驯养动物之外,人们也开始尝试播种植物。这就开启了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神农时代。《白虎通》就谈到“古之人,皆食禽兽肉,至于神农,人民众多,禽兽不足。于是神农因天之时,分地之利,制耒耜,教民农作”。

江西仙人洞、湖南玉蟾岩等众多考古遗址发掘的实物证明,一万年以前人类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。从野生植物的利用到尝试种植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, 也涉及多种植物。《书·舜典》记载:“帝曰:弃,黎

民阻饥,汝后稷,播时百谷。”通过对作物产量、品位以及环境适应性的反复观察和知识积累,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几种作物的种植。商周时期,人们只有“百谷”的概念(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有“百谷”,而无“五谷”)。“五谷”之说最早见于《论语》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。这实际反映了古代粮食作物生产从“百谷”到“五谷”的历史变迁,“五谷”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。“五谷”所指为何? 有两种说法,一曰粟、黍、菽、麦、稻,一曰粟、黍、菽、麦、麻。

谈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,人们总会说到“四大发明”。事实上,中国农业的“四大发明”(稻、粟、菽、茶,这还不包括养蚕、缫丝等其他农业技术发

明) 对世界的影响绝对不亚于通常提及的“四大发明”。据俄罗斯植物学家瓦维洛夫调查,世界上有 8 大作物起源中心,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。据统计,全世界最重要的 640 种作物中,136 种起源于中国,约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。可以说, 中国对世界食物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虽然中国是世界稻作的起源地且种植历史在万年以上,但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在北方,汉代超过 80%的人口居住在北方。晚至唐朝,仍有约 60%的人口生活在北方。这或许就是《史

(下转 11 版) ➡

← (上接 9 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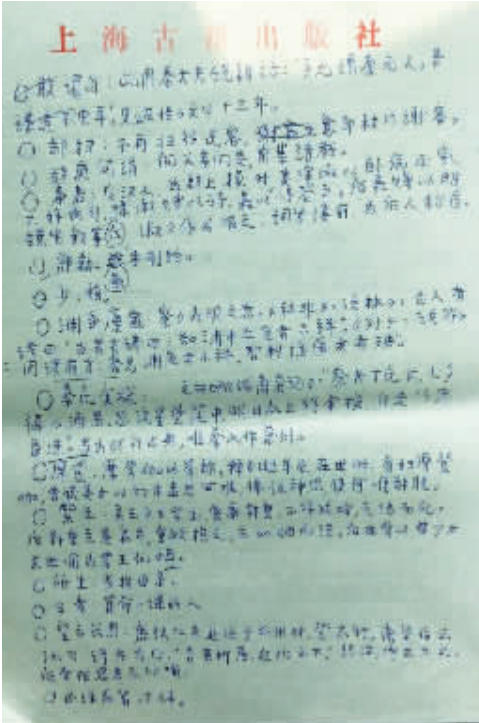
业余时间也会写点东西,包括报刊的小文章和论文。

我后来也写过一点著作,最典型的一本,是父亲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的一套诗词坊丛书,共 15 本。父亲当时有一本叫《炉边诗话》的书,香港中华书局觉得这类文章很好,适应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,就通过我找到父亲。当时我陪他见了香港中华书局的主编钟洁雄女士,钟女士表示我也可以写一本,让父亲帮忙修改一下。父亲便让我从 15 个选题中挑一本最有把握、最有故事的。我就选择写了白居易和元稹,书名就叫《诗情与友情》。

我所有的文章,第一读者都是父亲,他是老编辑、老老师,有时候会帮我修改。渐渐地,我自己有把握了,就不用他修改了。后来的个人著作有四本,还有合著。合著的书里特别提一下《浮生六记》,这是高社长约稿的。我做好以后给父亲看,他表示里面有很多错,帮我改了出来。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出注。我说我注不了,他也帮我加了好多。这本经过他修改增补的《浮生六记》,在国内的很多校注本中,至今都是比较权威的一本。国外学者也会引用古籍社的这本,一是因为古籍社的品牌,二是因为父亲的挂名。我当时自



晚年的金性尧耳朵听不见,非常依赖女儿金文男,但依然培养、提携她。右图为金性尧为金文男文章所作的修改。



己写了一篇前言, 父亲说我写得太嫩了。当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,写长文写不动了,但还是勉强趁精神好的时候写了一篇前言。这篇前言有一定学术价值,父亲后来在自选的集子中将它收录进去。

当年父亲被戴上“反革命”帽子,影响了我升大学,我还怨过,想着父亲如果是一个售票员, 或者是一个扫垃圾的,多好。后来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社,他虽然退休了,但依然培养我,提携我,我渐渐地也体

会到了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,非常感激。母亲去世以后,生活上是我在照顾父亲, 但学问上是他在培养我。

父亲去世以后, 我做过一个纪念集, 是由舟山政协文史委资助的。在这本集子中,我有幸收到了一篇沈鹏年先生的文章,披露了父亲编《鲁迅风》时期,同一些著名文人的通信,从这些白纸黑字的书信中,我有幸看到了父亲当年做过的许许多多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益的事情。当年《鲁迅风》没有出版经

费,父亲就自己出钱,还接济了很多文化名人。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来时, 父亲为他传递过书信。后来父亲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, 还出面主编了《文史》。

这些事情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。他晚年耳朵听不见,非常依赖我,但年轻时做过的这些好事,只字未提。但是,他早年为《古今》写文章这件事, 却给他心里蒙上了沉重的阴影,还著文作检讨。一位老人在晚年会有如此沉重的忏悔,

我至今都觉得很难过。自己做的好事他不记得,为《古今》写文章这件看起来不好的事,却让他毕生不能忘怀。

我退休以后, 全力以赴整理父亲全集, 至今已做了九卷全集,四卷集外文,十三卷,一共六百万字。这些大概是在三四年中做出来的, 离不开陈子善先生、以及古籍社的两位老编审的鼎力相助。我想把父亲的全部文章收起来, 供年轻学者研究,让历史来说话。

(照片均为金文男提供) ■